

顾维钧 回忆录

第四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中华书局



1939年9月2日國際聯盟第十七屆全體大會，代表演說新步出會議主席左起第四、三、二、一為金可利



1937年1月25日，顾维鈞在国际联盟行政院主席办公室，时为九十六届主席

目 录

第四分册

第四卷 出使法国(1932 10—1941. 7. 2)·下

第七章 欧战爆发后的外交活动	
1939年 8 月 22日—1941年 6 月.....	1
第一节 欧洲战争的爆发及其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影响	
1939年 8 月 22日—9 月 18日.....	1
第二节 惶惑不定的时期	
1939年 9 月 16日—10 月 21日.....	69
第三节 鉴于欧战爆发以及英、法和美国对莫斯科的疑虚,重新估价中国的外交政策	
1939年 10 月 21日—12 月中.....	115
第四节 中、法合作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至关重要的印度支那过境运输问题	
1939年 9 月—12 月.....	165
第五节 兵临巴黎城下前,法国外交政策的摇摆	
1939年 12 月末—1940年 5 月 17日.....	202
第六节 巴黎陷落和法国向德国投降	
1940年 5 月 18日—6 月 23日.....	256
第七节 日本对维希治下印度支那的进逼	
1940年 6 月末—8 月 10日.....	310

第八节	法、日关于印度支那的协定	
	1940年 8 月 19 日 — 9 月 25 日	377
第九节	对法、日 1940 年 9 月协定及德意日三国条约 的反应	
	1940 年 9 月下旬 — 12 月上旬	456
第十节	在维希关于欧亚两洲局势的一些谈话	
	1941 年 1 月 — 4 月	508
第十一节	调往伦敦和在葡萄牙的逗留	
	1941 年 4 月 — 6 月	563

第七章 欧战爆发后的外交活动

1939年 8 月 22日——1941年 6 月

第一节 欧洲战争的爆发及其对中国和 中国政府政策的影响

1939年 8 月 22日——9 月 18日

我于1939年 8 月 22日早晨，首次得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将签订的报告。第二天23日（星期三）我从报纸上和广播中获悉，里宾特洛甫已飞往莫斯科，互不侵犯条约已经签字。接着在巴黎的政治界、外交界和新闻界出现了一片混乱。我立即得出结论，两大敌对阵营，即所谓和平阵线和反共产国际集团，已不复存在。日本人也弄得不知所措。我马上致电外交部报告，并要求将电报抄呈委员长。这份电报表达了我对上述条约的看法，及其对于欧洲列强的远东政策和态度可能产生的影响。

那天晚上，我出席了美国大使蒲立德为詹姆斯·法利先生举行的晚宴。法利是一位颇为著名的民主党人，他和罗斯福总统关系密切。在那里我遇见了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皮尔逊先生，并趁机向他试探进一步从美方得到财政援助的可能性。在座的法国财政部长保罗·雷诺也参与了我们的谈话。皮尔逊显得对中国的事业极为同情。他也许是开玩笑地说，雷诺先生对援助中国打算提供多少数目，他也如数照出。雷诺似乎并不想承担任何义务，只是说，自从法国政府允诺了二亿法郎之后，曾采取过许多措施。（法国允诺给中国作为外汇平准基金的二亿法郎援助实际上还没有实现。）皮尔逊对过去中国在外汇上的控制

不严多少是有些意见的，他认为这是汇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外交部长乔治·博内也在座。他对前景表示悲观。在回答我提出的有关现实国际局势的问题时，他劝我立即把我的旧防毒面具换成新型的。蒲立德说，希特勒一直在准备发动战争。他认为，战争在两三天之内就会爆发。他又说，美国太平洋舰队当时正开往夏威夷。但是，他们三个人，法利、雷诺和蒲立德，似乎都对刚签订的苏德条约究竟有何作用感到疑惑不解。当他们转而征询我的意见时，我却为苏联签订这个条约辩解。我解释说，因为苏联要应付两条战线，当时对它说来，日本的威胁，似乎是最主要的。

次晨各报都刊载了互不侵犯条约的全文。条约内容的影响要比预料的深远。法国报界开始对俄国进行各种谩骂，极力诋毁。又有报道说英国已从莫斯科召回它的军事代表团（该代表团原拟随着英、苏政治协定的签订，再缔结一项军事条约）；同时听说，法国已开始征召第三、四类后备役军人约五十万人入伍。这天傍晚，又获悉对第二类后备役军人也已发出征召书。在伦敦，张伯伦在众议院宣布，英国要履行对波兰承担的义务。25日，英波同盟条约签字。在美国，据报道，罗斯福总统于24日对意大利国王发出和平呼吁。25日，他又向希特勒和波兰总统莫希齐茨基发出和平呼吁。同日，希特勒召见了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而且所有报道都说，他（希特勒）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条件。这最后一报道至少暂时给世界局势带来一线缓和的希望。

显然，孔祥熙马上注意到了我23日致重庆的电报，并回电作复，我于24日收到复电。他同意我的看法，即由于苏德条约签订所引起的欧洲局势突变，势必影响中国的整个对外政策。首先，他问我法国政府对最近事态发展的看法，特别是法国对远东问题的态度。其次，他问起法国政府针对远东局势有何对策。他

说,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调整,才能适应事态的新发展,这就需要对政策重新审查和讨论。他要求我全面电告导致这一事态发展的基本原因,以及我对此问题的看法。

我起草了一个较长的答复,并于8月25日发出。电文如下:①

漾电敬悉。德苏订立不侵犯协定,法当局颇示愤懑;即阁员中素主亲俄者,亦极失望。或认苏为半途卖友,意在激成西欧战事,坐收渔利;或疑苏根本实力不足,不愿卷入漩涡。至应付办法,因事出仓卒,除拟将军事委员团,步英后尘,即行召回外,尚未决定。自须探明苏方真意,及所传德苏协定所附密件是否属实,内容若何,并与英商议后,方能决定。至对远东,英、法原已商定共同防守计划,并不顾虑;且以日本所以号召之防共阵线,既被打破,势成孤立,且将受苏威逼,认为有利我国。此乃法当局对钧表示之大概也。总之,法政界目光浅近,均注重欧洲,忽视亚洲;不知苏为欧亚列强,不堪东西受逼,势必两害取轻,俾集中力量应付一面。乃法附和英国,与苏商议合作,既不愿包括远东问题,而于波罗的海②国家之安全,复不允予苏以完全保障,纾其顾虑。苏之怀疑英、法欲促成日苏、德苏战争,亦非无因。又忆去岁明兴③之会,被英、法槟斥于门外。苏虽为法之盟国,而法与德协定,并未事先告苏,反鼓吹法之前途在专心发展已有属地,不愿再与闻东欧问题,意似欲使德之枪口东向,使

① 8月25日长电和下文8月26日致蒋介石电,以及8月29日蒋介石的复电和8月31日重庆外交部的电报均录自顾氏所存函电档案原文。

——译者

② 即波罗的海。——译者

③ 即慕尼黑。——译者

苏当冲。加之法当局因内政关系，多数反对亲苏，一如英阁，益使苏难信任。一面德亦对日失望，日之陆军既为我牵制，不能攻苏，日之海军又反对订立军事同盟，不肯公然对英，则防共集团于德已失其功用，不得不改弦更张，俾打破英、法、苏和平阵线之谋，避免东西夹攻之危险。故德苏协定为两国设想，均非偶然。兹我国抗战方酣，需助于苏、英、美、法者一如既往，甚或较前更多，自无变更我原定政策之必要，应继续与各该国联络，使其积极接济。且苏既纾欧洲西顾之忧，或能增调一部分实力于远东，作进一步压迫日本之举，为我声援，而达中、苏对日共谋一劳永逸之目的。自宜在莫斯科方面探询苏之真意，并设法敦劝对日采取积极政策。英、法虽对苏愤慨，但如苏联以守中立为限，并无进一步接济德、义之举，彼亦不至有积极反苏之举。美虽排德，然重视远东，如苏对我态度不变，亦不至与苏为难而影响我国。至德在远东之实际利益在亲华，不在联日，为德军界、实业界、文化界所肯定者；现国策既主张与苏提携，此后能否与我接近，可向德探询，亦须视苏联对德真意，并恃其为我疏通。然我应最注意者，今后日本之态度与举动。此次日本外交失败，势成孤立，举国仓皇，势必另辟途径，力谋善后，大约不外三端：一、与苏妥协；二、亲英、法；三、与我议和。关于第一端，日本国内已有造成德、苏、日、义集团之议，德亦必设法对苏疏通，以获日本对德之谅解。今午德外长离莫斯科时已有努力于日、苏邦交改善之表示。但苏与日根本利害冲突，当不为所欺。但我宜注意第二端，英、法之态度将视欧战是否即行爆发为定。欧战起，英、法将以其久暂与结果难测，仍愿日本中立。惟此项妥协条件于我损益程度，须视美之主张；而美发言之效力，又须视美能否在

远东领导对日，及能否在欧为英、法后盾。昨晚美大使告钩，谓下周美之全部海军将由美西岸开往檀香山驻泊云，似有对日示威之意，堪为我慰。如一二两端不成，则日或试与我议和，贯彻其直接谈判之主张。如三端均不成，则彼将暂时观望，以待国际变化。一面以海军相机侵占英、法在远东之租界与属地。如英、法战败，即可据为己有，并以充侵略他处之根据地。如彼战胜，亦可为将来谈判交换条件。总之德苏协定甫成，各列强亦正在研讨应付办法，尚无决定。以上所述，大半为蠡见窥测，聊供参考，未必尽合将来事实，但今为我外交戒备时期，尤应于苏、英、美方面注意。是否有当，仍祈察核。

尽管我知道苏、德之间突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一定会使巴黎和伦敦深感意外，因而引起反响，修改其对外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然而我还是决定继续努力，在远东促成一个包括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在内的联合阵线，因为这是中国已经制订和希望继续奉行的政策。这不仅是为了我国自身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与远东有关的列强的最终利益。因而，尽管事态最近发展如此，我仍要朝着这一方向尽最大的努力。我在发往重庆的电报中指出，新条约的缔结，对中国是有利的，至少苏联因此减轻了它西部战线的压力，能够对远东更为重视，从而更加坚定地对付日本。苏联原有两条战线，其中欧洲的那一条形势一直不断地加剧紧张，分散了它的注意力。但是，条约对中国也是不利的，因为它必定会影响英、法对中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事实上，英、法直接的反应是倾向于对日本采取更为友好的政策。

8月26日，我向重庆发了另一份重要的电报。这次是直接发给委员长的。其中概述了我对中国在国际形势新发展中，应遵循的最优路线的看法。电文如下：

德、苏妥协，防共阵线打破，顿使日本孤立；而影响今后国际形势，亦匪浅鲜。蠡见所及，业详复庸之院长。电谅已呈钧览。此时如我商俄乘机与我积极军事合作，共谋达对日一劳永逸目的，实为上策。如苏联志在保境，或在欧别有所图，不愿在远东积极用兵，则至少应于形式上助我，在远东造成苏、英、法、美和平阵线以逼日本。北由苏联增调重兵，陈师满蒙边疆，南由美海军往西太平洋推进，隐示与英、法一致。再由英、法、美三国出为调停，劝告日本停战，撤兵议和。此时日本正在仓皇失措，另筹外交途径。对苏既多顾虑，又因怨德，未必愿与苏联妥协，势将谋与英、法、美提携。果尔，当能重视三国劝告，而对我让步。总之，窃意我宜利用目前外交优势，而设法运用国际途径，以达我恢复失地、保障主权之大目的。否则，世界外交形势剧变，夜长梦多。英、法既怀恨苏联，思欲报复，又疑苏、德另有互助密约，不得不亲日以谋抵制。如美不肯出为领导，积极对日，则在此欧局危急之秋，更难阻止英、法与日妥协。谨就国际形势，密陈管见，统候钧裁。

我担心欧洲局势的一系列主要发展，可能会对远东局势发生冲击作用。26日上午，法国外交部吉尔贝先生来访，更加剧了我的不安情绪。他通知大使馆，法国要改变其对日本和远东的政策。在这方面，我们讨论了法国调解中、日冲突的想法。他刚一离开，我就给委员长发了另一份电报，汇报我们的谈话，并再次催促他利用有利的外交形势，来达到我们抗战的目的。我说，法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已派一个代表前来通知我说，由于苏德条约的签订，法国将修改它的远东政策。法国政府正在审慎考虑和美国一起实现和平解决中、日冲突，而且想知道我们的观点。我说，我本人对此事的看法，已在我前一封电报中表达了。

我还向委员长汇报法国外交部的亚洲司司长再次提出许多有关他(委员长)对共产党态度的问题。该司长认为,委员长的态度是以政府和中共合作的政策为基础的,他想知道合作的条件是什么,以及这种合作对近几年来抗击日本侵略的成果如何。我在电报中指出,这些问题的目的似乎包含双重意思:一方面,法国政府想要看到中国加入英、法阵线,以便于与日本接触,同时避免中国加入到苏、德阵线中去;另一方面,法国当局似乎又很担心,中国由于以前和苏联的关系而将无法做出自由抉择。我问委员长,对这些问题应如何回答。

那天晚些时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肖维尔打电话要求和我的法语二等秘书汪孝熙继续进一步讨论有关法国调解的问题。这次我给外交部发了一份很长的电报。两天后,即8月29日,委员长来了回电。

回电是委员长亲笔起草的。电文说:

宥日与廿七日电均悉。兄见先获我心,请兄照此方针,积极运用。苏俄宗旨乃在专致力于远东,而对远东方面,甚愿自由行动。英、美、法合作以解决远东纠纷,应请英、法对苏之看法认识其在远东之方针,不可错以为如对欧之方针相同也,此点须囑英、法政府切实改变观点。中且能确信。但案德苏协定初告成立,而苏对英、法、美无法进行合作,亦无人能作仲介也。此事关键仍在美国,请兄密商驻法之美使,请美总统出而领导,为英、法、苏在远东合作之仲介,则苏联必乐从。此为根本问题,请兄积极进行。并为中向美使前致意。至于中、苏关系,此时完全自由。我国抗战,始终立于主动自立地位,决不稍存依赖。但此后形势,非多求与国不可。以中判断,苏联心理,最怕英、日同盟复活,犹恐对苏,故其未始不想藉美对英、法转圜,以解决远东问题耳。

中正手启，艳子机印。

8月31日，我收到委员长电报的同日我还收到外交部发来的一份电报，报道了委员长和驻重庆美国大使于29日就国际形势最新发展与中国政策的谈话。

电文如下：

昨日蒋委员长与此间美大使谈话，说明最近国际情势与我方政策。希照此政策对法方妥善应付，并力促其勿与日本妥协而牺牲中国，同时应以谈话内容密告驻法美大使，请其转陈美政府，并尽力协助，俾促成我方愿望。谈话如下：

(一) 德、苏签订不侵犯条约后，美政府对该二国取如何态度，此后对远东局势究将采取何种途径。

(二) 余得密息，英、法与日本之间将谋妥协作，甚至缔结类似昔日之英、日同盟，亦属可能。其目的在结成集团，控制苏联，压迫中国，根本破坏九国公约。然中国政策决不因是变更。中国正在抵抗日本之侵略，任何国家如与之勾结，而助长其侵略中国，即认为非友好行为。

(三) 苏联在东西两面各有可能之敌对，势难同时兼顾。余知苏联本意欲除去西顾之忧，而与其他有关系国共同应付东方。然苏联固知英、法二国不满德、苏之订约，此种行动未便由苏联发起。惟美国若能设法联合英、法、苏等共同解决远东问题，必与苏联之期望相合也。

(四) 余确信除美国领导远东有关系国，召集九国公约会议，或续开比京会议，或举行太平洋和平会议外，远东问题绝无解决可能。

上述四点系目前主要问题，此外，尚有须自中国政府立场说明之三事如下：

(一) 中国自由采取独立的外交，对英、对法、对俄在

政策上均不受任何约束。

(二) 远东问题，尤其是日问题之解决，实有赖于美国。中国惟美国之马首是瞻。中国之政策视美国之态度而决定。故美政府现时之态度，我方亟盼明悉。

(三) 深望美国严重劝告英、法，切勿以为日本之力足以安定并保障英、法在远东之属地。其实，我国民政府在西南早经稳定。其能安定保障英、法远东属地者实中国，而决非日本。此绝非空言，而余确信有此力量。

9月1日过午，我去美国大使馆拜会了蒲立德大使，和他商讨外交部电文中所述的各点。我对蒲立德说，委员长让我首先转达他个人的问候，其次，我将委员长在重庆与美国大使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他，希望蒲立德能够把这一内容秘密地转达罗斯福总统，并敦促总统利用他的影响来达到预期的目标。

然后，我进而解释我的观点。我说，苏、德新近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虽然从英、法的立场来看对欧洲形势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远东的形势，使得日本现在感到孤立。也就是说，日本已被它的欧洲主要盟友德国抛弃，这个盟友现在突然倒向被日本声称为头号敌人的苏联一边。这种改变了的形势，也意味着俄国今后在远东可以行动自如。以前，俄国必须应付两条战线，并不得不选择其中之一以集中其注意力。它一向认为日本对它是更大的威胁，因此，莫斯科决定和德国妥协是很自然的，为的是使它能够对远东边境加以更多的注意。

我接着说，因此，日本认为这一发展特别对它构成威胁。日本认为苏联在摆脱了欧洲压力的情况下，很可能会集中其主要兵力来对付它。所以，日本感到必须修改其对英、法的策略。看到日本已被德国抛弃，两个民主国家也急于想把日本从轴心国集团分离出来，因此，我认为这两个国家有可能改变其对日政

策。法国外交部已经向我透露，在欧洲外交形势改变的状况下，法国即将向日本作出友好表示。我说，事实上，据我了解，法国政府已经采取步骤来适应日本的一些要求，而这些要求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是未予置理的。然而，我认为英、法如果突然投入日本的怀抱，而且忘记近几个月来日本对他们所做的坏事，将会铸成大错。我对蒲立德说，这样只会留给日本一个不正确的印象，即英、法害怕日本，而且还会助长其对中国的侵略。

我说，蒋委员长确信，由于苏德条约的签订，说服日本放弃其侵华政策的时机也许已经到来。过去两年中，我本人一直在尽力促成北方的苏联和在南方的英、法、美进行合作，以便共同对日本施加压力。既然现在苏联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付日本，而且苏、日正在沿着满蒙边境重兵相向，进行战斗，这对三个民主国家来说，将是采取步骤显示对付日本的坚定立场的有利时机。

我接着说，实现北方的俄国和南方的三个民主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也许是确保远东二十五年和平的理想解决方法，尤其是日本军队已在中国陷入困境。如果英、法鉴于欧洲的危急形势不能分别向远东派出舰队，他们也许至少可以联合起来，迫使日本接受一项不仅对中国是公正的，而且也有利于在远东重建和平的解决方案。换言之，三国可以一面对日本保持强硬立场，并避免流露迫切与它寻求友好的愿望，一面与日本接触，提出愿意帮助结束所谓“中国事变”。因为众所周知，日本本身急于结束整个事变，三个民主国家可试行向它建议，表示他们愿意根据某些确定条款帮助它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我说，我感到英、法反苏情绪相当激烈，对他们来说，与苏联在远东合作可能是困难的。正因如此，美国能够为这一理想的合作起到纽带作用。我强调说，莫斯科与伦敦、巴黎之间的疏远不应该影响这三国在远东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一地区

他们确实是有共同利益的。如果欧战爆发，中、日继续敌对，日本会毫不迟疑地侵夺英、法在这一地区的领地和利益。我补充说，假如欧洲不幸卷入一场武装冲突的混乱之中，目前关于远东局势的总的解决方案，至少将能保证东半球的和平。我表示确信，尽管罗斯福总统挽救欧洲和平的努力已经失败，但在远东方面，他为和平而采取的任何积极行动，都可能获得成功。

蒲立德说，苏联已突然破坏了所有挽救欧洲和平的希望。它选择前天晚上批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是为了促使德国进攻波兰。他说，他知道德、苏之间有一项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只留下一小部分波兰作为德、苏之间的缓冲国。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英、法寻求与日本谅解和友好，以抵消俄国的影响，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如果俄国进攻波兰，就自然成为英、法的敌人，英、法必然会尽一切可能把日本拉向他们一边。

接着，蒲立德说，他理解到中国想要利用当前局势保持其独立和领土完整。他对蒋委员长的愿望表示完全同情，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蒲立德推测，中国并不在乎站在那一边，只要能实现保持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目标就行。

然后，我告诉蒲立德，蒋委员长明确地通知我说，就中国来讲，在选择对俄、对英和对法的政策上是绝对自由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约束可以阻止中国奉行一种独立的政策，甚至和中共的合作也不涉及牺牲其外交政策上的自主权。

蒲立德问到，中国准备在什么条件下与日本达成协议？他认为这是关键问题，罗斯福总统在与日本接触之前必然想要了解此事。我答复说，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接到什么指示。但是，根据以前的指示，我可以告诉蒲立德一些事情。达成解决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日军从中国撤出和遵守九国公约的原则。关于具体问题，在上海撤退和南京陷落之后，日本曾通过德国驻

华大使向中国提出条件，当他（蒲立德）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他就会有一个概念。于是我追述道，东京那时要求划内蒙为特别防共区；划出沿着满洲边境一直到天津、北平以南地区为非军事区；在中国、日本和所谓“满洲国”之间实行经济合作；承认日本当局和在北平的日本傀儡政权之间签订的一切条约；以及把上海定为中立或国际共管区。我说，南京陷落后，日本又增加了一项赔款的要求。

蒲立德询问中国如何看待这些条件。我回答说，如果日本坚持要在华北保留一些军队，我认为其数量必须限制在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数字之内。然而中国希望，为了进一步诱导日本从中国撤军，其他根据辛丑条约有驻军权的国家可以建议撤出自己的军队，并放弃他们在北平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的权利。至于经济合作，我说，这一问题可在一定的条件下商谈。

蒲立德议论说，对中国来讲，一揽子承认日本和北平傀儡政权签订的所有条约是困难的。我回答道，当然，那些条约必须逐一经过审查，以便确定哪些是可以承认的。至于上海，我相信中国将准备承认维持原状或至多是在西方国家保证下，承认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所形成的状况。

我补充道，依蒋委员长所见，如果不召开九国会议或另一个布鲁塞尔会议，或一个太平洋会议，远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蒲立德说，他认为不能再召开一次布鲁塞尔会议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至于这个会议的组成，他说，如果德国、意大利和俄国受到邀请而不来参加，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可以进行会议。他认为，在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之后，建立一个由美、法、英、中和日本组成的集团来和苏、德集团对抗，这也许是可取的。

我说，我对再次召开布鲁塞尔会议也颇感兴趣。事实上，除